

文庫博物館專集（三十九）

在对中国文化革命的研究中，许多中外学者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即文革中群众运动的表现形式基本是政治性的，群众提出的要求或表达的愿望始终是政治的，即使是由过去的经济因素引发的矛盾，在文革中也都表现为政治冲突。

事实上，文革中的群众运动提出过经济要求，这些经济要求比较集中表现在一九六六年底及一九六七年初的很短一段时间内，在当时被称为“经济主义风”而被中央明文下令禁止。本文试析发生于全国最大工业基地上海的“经济主义风”的原因及类型。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使用“经济主义”一词，只是为了行文方便而套用当时的称呼，并无贬义意思。

◇ 户口、所有制和身份

不是生活在中国，很难理解中国的两种身份制。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划分，造成了城乡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

城市户口是优越而世袭的：国家对粮食统购统销，不开放粮食市场，买粮食必须使用粮票，即使上饭馆吃饭，去食品店买点心，也必须使用粮票。只有城市居民才被发给粮票，农民吃粮得自己种；城市里的工作只向有城市户口者招工，农村户口要进城工作必须首先改变户口；住房分配只限于城市居民；孩子户口随父母，没有城市户口，子女也永远成不了城里人。

在城市户口中，还有种种区别：所在城市大小等级（如市级城市与县级城市）的不同造成地区身份差别，所在工作单位所有制（如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不同造成所有制身份差别，用工编制（如干部编制与工人编制）的不同造成编制身份差别，用工制度（如正式工与临时工、合同工）的不同造成正式工与非正式工身份差别，等等。

所有这些身份差别的后面是机会的不平等与物质利益的差别。身份最高的是全民所有制单位的职工。他们有着终身职业保障，享有连同家属医疗保险在内的“大劳保”，有着病假、产假工资，退休后可领取退休金，等等，生老病死有依靠。

即使是“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工资基数也依所在城市的级别以及消费水平而划分成不同类别。上海属于“八类地区”，工资基数在全国领先；上海郊县属于“五类地区”，工资基数便比上海市区低好几档。上海的生活、文化、教育水平向来为全国之先，加上计划经济优先发展上海等大工业城市，使上海与内地其他城市原有的差距更为拉大。

而在城市的几种所有制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工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区别。如集体所有制职工的起点工资和退休工资都较全民所有制职工低，医疗保险是只保个人不保家属的或只保一半家属费用的“小劳保”，等等。

在集体所有制中，还分“大集体”、“小集体”，作为区政府或县政府工业部门管理的“大集体”，工资福利虽较全民企业差些，但职工的职业一般较稳定，近乎终身职业；而作为街道或里弄管理的“小集体”的职工收入则更少，且没有医疗保险及退休、病假工资。

城市职工中地位最低的是临时工、合同工与外包工，不但无法享受任何劳动福利或养老保险，而且职业也十分不稳定，许多人的工资不是月工资而是日工资或计件工资。文革前夕全民所有制正式职工的最低工资一般是每月四十元左右，集体所有制职工一般是三十五元左右，而临时工、合同工或外包工中许多人收入则不到三十元。当时最低生活水平线为家庭成员平均生活费在九元以下，三十元收入只能养活三个人，而那时一般家庭起码有二个以上的孩子。

除了经济待遇，在另外一些方面，全民所有制的职工也明显地优于其他所有制的职工。例如全民所有制的职工可以组织和加入工会，集体所有制职工则大部份无此权利。文革前夕上海272.13万职工中，集体所有制职工为59.76万人。这59.76万职工除上海市手工业局所属的部份合作工厂职工外，都不被允许组织工会〔一〕。而一九五三年修正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规定：非工会会员的“疾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间的工资与救济费，非因工残废救济费，供养直系亲属救济费，养老补助费，丧葬补助费，只能领取规定额的半数〔二〕”。至于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则不但不能参加工会，而且还不能参加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身份最低的是农民。比起城市的就业居民，农民生老病死除了靠自己，便只能靠子女。作为农民，意味着匮乏的经济收入，靠天吃饭的艰苦劳作，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或社会福利的人生。文革前对人的最严重的惩罚，除了关监狱或送去“劳动改造”，便是革去城市户口，流放农村。

所有这些身份，有些是先天就被政府分配定了的，如城乡身份、地区身份，随父母的身份等级而定。于是人还未出世，身份级别却已注定，要改变与生俱来的身份，除了上大学、参军、被招工或与高身份者结婚等极少途径外，几乎无路可行。

有些身份是被后天分配的，如所有制身份，在每个人第一次被分配职业时由政府派定，而这第一次分配几乎是定终身的，以后要改变则非常困难。例如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身份转换的障碍，是许多人在试图调动工作时所根本无法逾越的。

还有些身份也是由政府分配的，如编制身份：“干部编制”相当于西方白领阶层，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医生、教授等等，属于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工人编制”则相当于西方的蓝领工人，只能当生产工人，即使有希望升迁当上管理人员，要改“工人编制”为“干部编制”也十分困难，许多人便只能长期“以工代干”，以工人的身份代做干部工作，等上个三年五年甚至十几年，待有了“干部编制”的名额，方能改变身份。

地区、企业或各类职业之间的工资收入、福利待遇及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甚至差距很大，在任何社会都是正常现象。问题是，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一切不是个人努力或个人选择的结果，而几乎完全由是政府一次性分配，靠个人的努力改变已被分配定了的身份非常困难，有的人一辈子就是为了了一张城市户口而奋斗。于是在这个最信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国度却有着最多的宿命与无奈。而当时的中国却又是大力宣传平均主义的，这使得所有低身份者感到分配不公。人们既然无法自己选择身份，便只能寄希望于掌握分配权者放松或改变分配政策。

对经济利益期望的膨胀也是经济主义的引发因素。1949年以来越来越强化的计划经济，使得人们对自已的经济利益的自主选择范围与自我奋斗空间日益缩小。工作的努力与物质收入不成正比。一切都是被分配的，收入的多少只在于每次晋级加薪时的百分比，靠自己根本无法开辟其他创造财富的途径，于是人们也只能寄希望于分配政策的松动。掌握分配权的干部在文革中威信降低，增加了放松或改变分配政策的希望。

自一九五八年以后，职工工资增长速度缓慢，一九五八年上海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是七十点七元人民币，而在以后几年最高也只升到一九六四年的七十点七八元，到一九六六年降到六十六点五三元〔三〕。每次加工资的决定权都在干部手中，文革中这些干部成了“走资派”，那些对过去工资评定不满的工人得以有理由要求纠正“工资评定中的修正主义路线”。此外，许多工厂在一九五九年至一

九六二年的经济衰退时期为紧缩开支，削减了工人的劳动保护费用，例如延长工作服的发放周期、缩减或降低劳动保护用品的发放范围或标准、减少夜班半夜餐津贴的发放对象、降低有毒有害工种工人的营养津贴标准，等等，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仍未恢复。而这些劳动保护用品或费用对低工资的工人来说，过去都是一笔不小的隐性收入。于是一到文革，许多工人便理直气壮地要求恢复原有的劳保待遇。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九日的“安亭事件”标志着工人造反派的兴起。中共上海市委在“安亭事件”中第一次被迫公开向造反派让步，签字同意“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当时简称“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虽然，这五项要求都是“政治性”的，但却给其他造反派以启示。不久，十一月二十二日，“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迫使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劳动局的代表签字同意他们的六条要求〔四〕。内容除了当时千篇一律的要求承认其为“革命组织”、行动为“革命行动”等之外，还要求取消临时工、外包工等制度，要求自即日起不得辞退临时工、外包工。这种要求超出了文革所允许的政治范围，涉及到用工制度。可以说，这六条要求是“经济主义风”在上海的开端。

◇ 最先提出经济要求的组织

最早提出经济要求的不是工厂的正式职工，正是这些没有稳定职业的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发加工的外包工，还有曾经在上海工作过后来被动员回乡的“回乡支农”职工；以后又进一步发展到支援内地职工和文革前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

第一类组织由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组成。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形式曾因终身职业制的加强而削弱。六十年代，国家主席刘少奇有感于铁饭碗用工制度的弊病，建议扩大临时工、合同工和外包工用工形式，增加劳动用工制度的灵活性。一九六四年前后的经济好转时期，上海许多工厂陆续招收了大量的临时工和合同工，或将一些生产工序外发给里弄闲散劳动力加工。这样的就业形式既扩大了就业面，也减轻了企业的负担。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单一性及封闭性，劳动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福利与终身就业高度重合，这些处于体制外的工人的生老病死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加上就业的不稳定感，文革批判刘少奇，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用工制度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证。

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在文革中自称“红色工人”。他们在上海的造反组织最初名为“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不久，为与全国的这类造反组织统一，改称为“上海市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这些组织的要求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条：一，要求享有职业保障，工厂不得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及外包工，取消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就业制度。二，要求与全民所有制工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同等待遇，提高工资与劳保福利。例如能够参加所在工厂的工会，能够参加文革运动并组织自己的群众组织，将计件工资、日工资改为月工资，享受医疗保险和病假工资，等等。三，一些在文革中被工厂辞退了的临时工、合同工要求恢复工作。

他们召开大会，逼着干部签字。这场运动在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接见全国临时工、外包工造反组织的代表并表达同情后达到高潮。（见本刊 z k 9 7 0 7 e、z k 9 7 0 8 a，方圆：《自由工人运动的先驱——独立工会“全红总”》——编注）江青还建议必须允许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被解雇者马上回原单位，工资补发。消息传出，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后被解雇的临时工、合同工纷纷回原来被辞退的工厂要求复工。于是造成有的工厂临时工、合同工过多，特别是季节性生产的工厂，窝工现象更严重；一些处于生产旺季迫切需要劳动力的工厂却由于怕生

产淡季时无法辞退工人而不敢招工【五】。

第二类组织由“回乡支农”工人组成。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的经济衰退时期，许多工厂开工不足或停工、半停工，不得不动员家属在农村或有办法回原籍安家落户的城市职工辞职，许诺待国家经济情况好转后，将优先请他们回厂复职。上海当时共精简职工三十一万二千人，其中十八万三千人回农村，十二万九千人回上海城镇街道。被精简者大部份是一九五七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这些人被动员回乡的多；少部份人是一九五八年后参加工作的新职工，这些人被作为辞退对象【六】。所有回乡职工的户口都被改为农村户口。

一九六三年以后，国民经济开始回升。但是，当初动员那些职工回乡时许下的以后让他们回厂复工的诺言并没有兑现。人口的急骤增长所带来的愈来愈大的城市居民的就业压力，使得当政者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已被动员去农村的当年职工。虽然上海也曾设法解决他们回乡后的困难。例如将上海郊县的回乡职工吸收进厂当临时工，所得收入与所在农村的生产队四六分成，称为“亦工亦农”。一九六三年以后，上海以这样的方式陆续安排了三万余名回乡职工【七】。但这是杯水车薪，而且，没有恢复他们的城市户口。

这些被动员或辞退的回乡者，一旦离开城市和工厂，便立即丧失了原有的“铁饭碗”以及作为城市居民的种种利益，城乡之间由于剥夺农民的计划经济以及两种户口制度所造成的愈来愈大的经济及文化的差别，加上回乡后立即遭受到的“大跃进”所造成的农村大饥馑，使得他们意识到城市户口及铁饭碗的宝贵。这些当初“为国家分担困难”的回乡职工发现自己犯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不但自己从工人变成了农民，从“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而且自己的子女也永远变成了地位最低的乡下人。他们当然急切地希望重返城市和工厂。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当初对他们许诺言的干部身上，也寄托在文化革命运动上。

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动员回乡的重点在一九五八年以前进厂的职工，因为上海是老工业城市，职工中的比例以一九五八年前参加工作的为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进厂的大多为社会闲散劳动力如职工的家属或个体劳动者等；而其他许多城市的重点辞退对象则是“大跃进”发展工业时招收的大量农民。【八】

到一九六七年年年初，当初被动员回农村的十八余万人中，共有超过五至六万的人回到上海，他们认为：上海精简人员工作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原来规定精简城镇人口主要对象是一九五八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工人。但上海在精简时，篡改中央指示，把五八年以前进厂的老职工也精简回乡”；而且当初答应将优先让他们复工的诺言根本没兑现，这是言而无信【九】。他们提出：“我们要饭吃！”“我们要复工！”【十】

此外，那些当年被精简回上海街道城镇的近十三万家属，虽然以后有一半左右陆续进了小集体所有制的里弄生产组或街道工厂，但文革中，他们要求回到全民所有制或大集体所有制的原厂工作。【十一】

第三类组织由文革前的支内职工组成。

作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的上海，历年来曾派出大量人员支援全国各地的工业和文化建设，有些工厂或商店甚至全部人员与设备迁去外地。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提出建设大、小“三线”，上海更是人员和设备的供应基地。但上海与内地生活水平的差距，使向来追求生活舒适的上海支内人员深感不适应，而文革前内地城市

的生活因经济衰退更比上海艰苦，即使是政府配给的粮食与副食品定量也经常供应不足，令所有内迁者后悔。文革中，那些被动员内迁的职工纷纷回上海，许多人甚至合家返沪。他们批斗当年动员自己内迁的工作人员，说当初对他们的动员是强制性的，要求还他们上海户口及上海的工作。据载，仅仪表、化工、第一机电这三个局，文革前两年支内的二万六千多名职工，一九六七年初返沪的已近二万【十二】；更有些内迁厂的全部原上海职工都回了上海，如西安变压器电镀厂一千五百名职工全部返沪，贵阳永阳电表厂走得只剩厂长、党委书记两个人【十三】。

第四类组织由“上山下乡”、“支农支疆”的青年组成。

上海在六十年代以后，为了减轻就业压力，曾动员许多当时被称为“社会青年”的无业青年和刚从中学毕业的学生去上海郊县农场或远在新疆的农场工作，这种动员很多是半强制性的。文革中他们也大批返回上海，要求将户口报回上海市区，不愿再待在艰苦的农场或边疆。如上海郊县的长兴岛，各农场共有下乡青年一万多人，跑得只剩一百人【十四】。

◇ 职工中的经济要求

上面所说的几大类组织的目标主要在户口或职业上，他们所掀起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但他们毕竟不是正式职工，而且许多人当时已不是上海居民。真正使上海的生产和经济秩序受到巨大冲击的，还是来自在职职工的经济要求。

文革中上海在职职工提出经济要求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天，上海港务局所属九区的部份学徒工在抢“黑材料”（即枪人事档案）时发现一份有关学徒工工资的上级文件。对照这份文件，他们认为自己的学徒期被定长了。于是就到局里去造反，要求补发转正的工资差额。局党委书记同意补发一年。【十五】

提出经济要求的最初只是非正式职工以及已经去外地的职工，这个消息一传开，各单位的在职职工纷纷起而仿效。十几年来习惯于被动地等着党和政府分配利益的职工们，一旦发现自己有了主动争取济利益的机会，马上寻找各种理由与当权派谈判。几天之内，这股风便迅猛地席卷了所有的工厂和企业。所有的局长、处长、科长都成了宝贝，被人们争先恐后地抢来抢去，逼着在各种经济要求的纸条上签字。

从所能收集到的材料来看，职工的经济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工资。认为过去评定的工资级别不合理。许多人提出，本单位的领导在过去加工资时，没有按照有关文件办理，压低了工资标准，因此要求按当时的文件重现评定自己的工资级别，并补发这些年的差额。如上海圆珠笔厂工人提出过去评级不合理，要单位领导同意将凡工资低于一九六三年该厂平均工资的，一律提高到平均工资水平，并自一九六三年始补发，共七万多元。【十六】

在要求补发工资的风潮中有许多是学徒工提出的要求。国务院规定学徒工的学徒期限可以依工种的繁简分为三年、二年不等；一些技术简单的熟练工种如搬运工、清洁工等，更是没有学徒期，只要半年试工期满便可转为正式工。上海却一律规定三年【十七】。学徒工没有工资只拿十八元津贴，正式工起点工资便是四十二元。而学什么工种大多是分配而并非学徒们自己的选择。这使许多简单工种的学徒工感到既在学技术方面又在经济方面吃亏。于是许多熟练工或简单工学徒纷纷要求缩短学徒期并补发工资差额。前面所提港务学徒工造反一事即出因于此。上海第二商业局一九六七年初曾补发工资六十三点七万元，主要便是用于学徒转正期三年改两年【十八】。而上海港务第四装卸作业区为此一次补发近四万元，平均每人补发三

百至四百元，有的近千元【十九】。

增加工资的另一途径是先要求改变所在单位的所有制，然后根据新的所有制身份标准增加工资。最多的是要求将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如上海的人力装卸运输工人曾要求上海市委领导签字同意将他们“统一归口”，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二十】。

职工要求经济的第二方面表现是要求补发或增发各种福利费用或劳动保护物品。如交通费、早餐晚餐费、加班费、洗澡费、有毒有害工种营养费等等工作津贴，以及工作服装、工作手套、工作鞋、洗脸毛巾、肥皂、套鞋等等劳动保护用品。其中，有些是低福利的集体所有制职工对全民所有制企业福利的攀比，有些则是企业五十年代曾经实行过，后来被取消或降低标准了的。上海第二商业局便为此补发九点就四万元【二十一】。

职工要求经济第三方面的表现是抢占住房。文革前上海职工住房主要由企业或政府分配，人口稠密的上海住房分配向来紧张。“文革”中许多运动对象被缩小或赶出住房，一些人便去抢占那些房子。尚未分配的空房也是抢占目标。这种抢占住房的行动大都借用单位造反队的名义而为，甚至还有一家三口组成一个造反队去占领一栋房子的。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自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除了运动对象的住房三十万平方米被抢占外，五天内全市所有待分配的空房也都被抢占一空【二十二】。

职工要求经济的第四方面的表现是分资金如年度生产资金，工会基金等。例如邑庙区扎排组将一九六三年以来所积累的五万元生产基金全部分光【二十三】。个别合作企业的职工还抽回入股股金，等等。

职工要求经济的第五方面的表现是要求发放各种文革活动经费，如串连费、宣传费、袖章费等。或要求提供宣传工具如扩音器、喇叭等，交通工具如轿车、摩托车、自行车等。这方面的费用开支非常大，据当时对轻工业、教育、商业、劳动等四个局的调查统计：这四个局共有二百九十七个群众组织，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上旬到一九六七年二月底，共化去经费五十五万六千元【二十四】。

还可以列出职工经济要求的许多内容，但主要是这几种。如果说非正式职工的临时工等要求的是身份平等的话，正式职工要求的则是经济平等。提出经济要求者，有的是全市性职工造反组织，如成员以民办小学教师为主的造反组织“小教革命联合造反总司令部”，要求民办小学改公办，教师按公立学校标准发工资和福利费；又如成员以一九五八年进厂的青年工人为主的“五八兵团”，要求缩短三年学徒期，并补发工资差额。还有许多组织只是为某个经济目的临时凑成，目的达到便解散。

作为上层造反组织的上海最大工人造反派组织“工总司”总部，从可以查到的资料来看，除了要求文革活动经费外，没有提出过明显的经济要求。“工总司”提出的口号都是政治性的，所提的要求也都是政治性的。不过，“工总司”的许多的工厂基层造反队却多少都投入了这股风潮。参加者大多是工厂的普通工人。

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四月统计：上海一九六七年一月，仅增加、补发职工工资、奖金、津贴、福利费，分掉工会节余经费、集体公积金、股金，以及发放串连费、物资等等，就耗资三千五百万元至四千万万元【二十五】。而一九六六年上海二百十二点四四万名全民所有制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总额是一亿四千一百万万元【二十六】。其中，华东电业管理局便为所属工厂提取补发工资一百二十八万元，相当于该局四个月的工资总数【二十七】。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底至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上海所有的银行门前都挤满了提款的人群，最多的一天支出现金二千八百万元〔二十八〕。由于提款数量大，单位多，上海各银行的现钞几乎被挤兑一空。

◇ 后果

面对越来越膨胀的经济要求，各级干部束手无策。他们若签字同意各种要求，与他们过去一贯坚持的原则不相符合；但若是顶着不签字，又会招致“对抗革命群众”的罪名。为了缓和与群众的矛盾，上海市委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中旬，“安亭事件”后不久，同意将上海郊县的“亦工亦农”回乡工人收入与生产队的四六分成改为百分之一百归回乡工人〔二十九〕。这是上海市委为了缓和矛盾作出的第一次经济上的让步。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共华东局代表、华东局工业办公厅主任黄宇齐，与上海市劳动局副局长于永实签字同意临时工、外包工的六项要求；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市劳动局局长王克在支农回乡工人的要求上签字，市劳动局将这两份签字的协议，于十二月二日作为正式文件发了下去〔三十〕。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市委成立了以副市长宋日昌为首的劳动工资接待小组〔三十一〕。但局势的混乱，使得这个小组从一开始成立起就遇到极大的困难，根本无法开展工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主持市委会议宣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陶铸的指示：“现在很被动，要争取主动，对他们的要求，要尽量解决。”十二月十五日，市劳动工资委员会向中央打报告希望给予明确答复。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得不到中央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上海市委制定了《在与群众协商时对几个具体问题的暂行处理意见》共七条。内容不但包括临时工、外包工等的工资福利，还包括全民和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劳保待遇、病假产假工资、学徒期限、交通补贴等等〔三十二〕。

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市委副书记曹荻秋在有关会议上传达市委书记陈丕显的意见：“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三十三〕。会上讨论了五条：其中三条是：一九五八年以后精简下放的工人全部回厂安排工作、街道工厂适当增加劳保福利、长期的临时工和外包工改为长工〔三十四〕。第二天，市劳动局又配合市委这五条制定了两个具体方案并将方案向下传达〔三十五〕。

在基层的干部们，不少也顶不住包围和批斗，签字同意群众的各种的经济要求。仅铁路局全局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便共签了六十三份工资福利协议，金额达三千零五十万元〔三十六〕。

在许多工厂和生产单位，人们无心工作，日夜包围着各级干部，进行各种经济谈判。上海海港近六千人离开生产场所，致使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旬的日装卸量从日常的九万吨下降到三万五千吨〔三十七〕。上海铁路分局从一月一日到一月八日，开往南京与杭州的客车计划每天二十一流，实际开出只有十七列；货车装卸计划为六百五十辆、二万二千七百四十二吨，实际只完成七十二辆、二千六百十五吨〔三十八〕。由于交通运输受阻，一月一日至八日，上海的七个发电厂的存煤量告急，平均只够用三天，其中望亭发电厂更是因为燃料不足，十一只炉子停了五只，发电量从每天四百万度下降到二百万度〔三十九〕。纺织行业一九六七年初的缺勤率达百分之十，轻工业局全局五百六十二个工厂中有三百零八个完不成一月份的生产任务〔四十〕。上海面临瘫痪威胁。

许多拿到各种补发款项的人，马上将钱购买久已渴望的商品，于是，本来就供应不足的市场货源更为紧张。上海最大的百货商店中百一店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至

八日的总销售额比上月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点一，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六点三。许多商品脱销，这又造成市民的恐慌心理，一些市民抢购囤积煤球、草纸等日常生活用品。〔四十一〕。

生产的大滑坡，使本已处境困难的上海市委陷于绝地。上海市委“经济问题放松些”的打算，更为自己增添了被打倒的理由。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工总司”与其他三十一个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称当前发生在上海的生产和经济混乱是“上海市委坚持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同日的上海《文汇报》全文登载了这份传单，并加编者按，将这场要求户口和经济的运动称为“经济主义”。接着，一月十一日，毛泽东要求向全国广播《紧急通告》，《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同日，中共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从此，“经济主义”更被称为“反革命经济主义风”或“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上海市委试图在经济方面有所放松以缓和与造反派的关系的努力完全失败。上海市委试图以主动的姿态参与文革，结果是增加了自己的罪名。

其实，《紧急通告》及稍早几日的另一份被毛泽东称赞的传单《告上海全市人民书》都是在陈丕显的提议和支持下起草并印发的〔四十二〕，为了阻止上海生产的滑坡，陈丕显打算向全市人民发出呼吁。考虑到上海市委已被造反派“炮轰”得失去号召力，他希望借助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及运用当时最流行的传单形式。陈丕显的努力并没有挽回上海市委的颓势，上海市委最终还是被定为“经济主义风源”，《紧急通告》在文革中的功劳从此归于“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

一月十一日这天，毛泽东还指示中央文革小组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向上海“工总司”等群众造反派组织发去贺电。第二天，上海即召开数十万人的“欢庆中央贺电，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不几天上海掀起夺权热潮，这个热潮在当时被称为“一月革命”。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上海的文革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工总司等38个造反派组织为发起单位。被称为“经济主义风”的风潮，在上海所引出的最直接的政治后果，是加速了中共上海市委的被打倒，确立了以“工总司”为首的造反派组织在上海文革中的左派地位。“工总司”从此被作为“工人阶级参加文革”的楷模，成为中央文革最重要的地方力量及社会基础。

至于人们在这一时期中提出的要求，虽然当时作为“经济主义风”被否定，但其中许多要求以后还是被考虑。如学徒期限，自一九六八年文革中第一批新工人被招收进厂后，便按工种的技术程度分为半年试工期及二年、三年不等。工会会员和非工会会员在福利待遇及家属劳保方面的差别，一九七一由上海市劳动局颁发文件取消；与此同时，上海一九六六年以前进厂的临时工全部转为正式工〔四十三〕。这些政策上的变化不能不说与文革初期的这场规模如此之大的工潮般的“经济主义风”有关。不过，“支农回乡”职工则没有如此的幸运。一九六零年向他们许下的以后让他们重返城市的诺言，直到二十年后，即一九八零年以后才部份兑现：允许他们能有一个子女“顶替”回上海工作。

◇ 结语

文革是一场千百万人参加和投入的运动，人们必然会表达和争取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政治及经济的要求。文革初期对大多数干部的批斗，既源于上层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源于底层群众对自己压抑感及不满的宣泄。十七年越来越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严重地束缚着人的主观能动性，掌握实权的干部越来越成为他人命运的主宰者。毛泽东反“走资派”的号召使群众得以对这些干部进行清算。因此，当“文化革命”体现于群众对政治的参与时，上层的导向与底层群众的愿望是相互交错而又相互影响的。

但是，文革毕竟是上层政治斗争的产物，与中共执政后所有群众运动一样，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始终只能是对党中央及毛的决策的响应，很难充实和发展自己的主体意识，一旦对文革的目标有所逾越，便会遭到禁止。“经济主义风”是文革中最具自发性的群众运动，但正是由于其完全的自发性而不容于文革，只存在了一个多月便被禁止。

从可以查到的资料看，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初），群众组织提出的要求虽然都是政治性的，但内容不外乎：要求承认自己的组织是“革命组织”，要求承认自己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要求销毁“黑材料”，要求给予参与文革运动的方便如提供活动经费、宣传工具、交通工具或要求印发自己的传单等等。但是，没有一个组织提出改进现行制度的要求。只有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组织提出“取消临时工、外包工等不合理制度”，要求在政治经济上与正式工人平等【四十四】。虽然一九六七年夏以后，一些红卫兵提出改革社会制度的设想，但那已是在“经济风”之后的事了。

“经济主义风”是群众对一九四九年后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压抑和剥夺人的主动性和权利的不满。但耐人寻味的是，尽管“经济风”的矛头是指向计划经济体制，反对以行政手段将人划分等级，反对以行政手段分配职工的经济利益；但是这些反对行为的思维方式仍未跳出计划经济范畴。因为没有一个人提出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由少数握有分配大权的当政者决定人的身份和物质利益的制度。人们反体制的目的只是为了使自己能进入体制或更多享受体制内的特权，只是要求体制对自己网开一面。人人痛恨身份制所带来的不平等，人人却又希望自己能得到高身份。同时，人们反对因户口制度和用工制度所造成的等级身份，却不反对因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而划分的等级身份。例如“上海临时工、外包工造反总司令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与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及上海市劳动局所签订的那份六条要求中，在不得辞退临时工、外包工条款，及安排文革中被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复职条款后，都特地注明：“黑六类除外”【四十五】。“黑六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及资本家。而政府后来的解决办法，也只是回到体制中去。所以，文革时期对人的控制比文革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山下乡”使得职业和身份更完全是被分配的，没有个人的选择自由。工资差别也被缩小到只有工龄差别，而无技能等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别。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比起成年人，年轻的红卫兵们在文革初期的经济要求则简单得多。除了要求发放与文革有关的串连费及活动经费外，我们没有发现这些到处造反的学生在一九六六年底至一九六七年初的“经济主义风”中提出过属于自己的经济要求。与工厂的工人要求提高或扩大福利待遇相对照，没有学生提出要求提高助学金或扩大助学金发放范围。此外，在当时大、中学毕业生由所在地区或学校统一分配工作的制度下，那些面临毕业的大、中学生甚至没有想到趁机要求为自己分配社会地位高或福利待遇好的职业。体现出他们理想主义的一面。

注释

【一】上海市总工会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关于集体所有制工厂企业职工要求组织工会的请示报告》。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公布，一九五三年一月二日修正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

【三】上海市统计局：《一九四九年——一九七八年上海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

【四】上海市劳动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日：《（六六）沪劳企字第一一四号》。六条要求是：（一）承认上海市临时工、外包工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二）承认我们今天的行动（召集大会）是革命的；（三）取消临时工、外包工等不合理制度。（积极支持将群众意见向中央反映，请中央批示）；（四）从今天起不得借任何借口辞退临时工、外包工（黑六类除外）；（五）召集全市临时工、外包工大会，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六）文化革命运动中对已辞退的临时工、外包工两星期内极快复工，安排工作。（黑六类除外）。

【五】王年一：《一九四九—一九八一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出版。

【六】上海市统计局：《新上海四十年》，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九零年出版。

【七】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现在农村的精简职工的安置意见》。

【八】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急需请示的几个问题》中提到：中央原来规定精简城市人口的主要对像是“五八年以后来自农村的新工人”。但上海在精简时，篡改中央指示，把五八年以前进厂的老工人也精简回乡（据了解，精简的职工中，工龄在十五年以上的占百分之七，四级以上的技工多达一万二千余人）。目前已有五、六万人回到上海，要求复工。

【九】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急需请示的几个问题》。

【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七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反对经济主义大事记》。

【十一】同【八】。

【十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九年：《上海一月革命大事记》。

【十三】同【十一】。

【十四】同【十一】。

【十五】同【九】。

【十六】上海市人民银行小东门分理处革命群众、上海市南市区人民银行满江红革命造反团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给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的电报。

【十七】同【八】。

【十八】上海市第二商业局一九六七年六月六日：《关于刮经济主义妖风的情况汇报》。

【十九】同【十五】。

【二十】同【十一】。

【二十一】同【十七】。

【二十二】同【十一】。

【二十三】同【十五】。

【二十四】同【九】。

【二十五】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四月：《关于清理经济风时所发款项并要求退还的工作情况总结》。

【二十六】上海市统计局《上海职工情况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

【二十七】同【十一】。

【二十八】同【九】。

【二十九】同【九】。

【三十】同【十一】。

【三十一】同【十一】。

【三十二】上海市劳动工资委员会红色造反队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是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罪魁祸首》。

【三十三】同【十一】。

【三十四】同【九】。

【三十五】同【九】。

【三十六】同【十一】。

【三十七】同【十一】。

【三十八】同【十一】。

【三十九】同【十一】。

【四十】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各产业局会议记录》。

【四十一】同【十一】。

【四十二】金春明：《“文化大革命运动”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

【四十三】上海市劳动局革命委员会一九七一年：《关于工厂企业中没有参加工会的职工病假工资待遇的通知》及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的《补充通知》。

【四十四】同【四】。

【四十五】同【四】。

本文为《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中的一个章节，交网上发表时作者又作了些修改。该书一九九六年由台湾时报出版社出版，原书共四十万字。

□ 寄自 xiaowei@pacbell.net

~~~~~  
【运动记愧】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杨绛《干校六记》小引

• 钱钟书 •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

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症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都不过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象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账，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

《浮生六记》——一部我很不喜欢的书——事实上只存四记，《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发现大小作家们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已成为文学研究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了。谁知道没有那一天，这两部书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 输入：xufeng

~~~~~  
【往事如烟】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三十年前的温州武斗

• 宋宏亮 •

温州在中国有了名气，是因为它的私有经济走在全中国前列。但今天有多少人还记得，温州在文革时代亦是一座武斗名城。

1968年温州在文化大革命鼎盛年代，两派对立的群众组织相互进行了激烈的武装冲突，双方凭借各自政治军事后台，动用正规军武器装备，战斗之激烈为温州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温州武斗最后以有江青和林彪支持的工总司派胜利为结束。为了悼念本派牺牲的同志，工总司大兴土木，在温州松台山建造宏伟的烈士群墓，墓碑上有名有姓的阵亡者上千，加上伤亡更重的另一派温联总阵亡者，温州武斗直接阵亡军民应该在三千上下，伤者无计其数。财产损失以市中区最为惨重。双方火攻对方总部，市中区连带建筑全部化为灰烬，温州元气大伤。

◇ 温柔富贵之州

温州位于瓯江入海口，地势三面环山，一面朝海，这块瓯江的冲积平原与飞云江出海口瑞安市相连，沿海狭长伸延，大约有300平方公里的世外桃源。这里山明水秀，人灵地杰。

温州往内地陆路交通不便，火车直到1998年5月才通车。人文传统是出海经商，不问内地政治纷争，因而历史上从无剧烈战事，明末皇帝南逃，曾在温州得以喘气，曾经争取地方豪强支持以图再起，竟然无人响应，愤而浮海出走。温州人擅长买卖和小手工业，倦于政治，长期的国共内斗，在温州历史上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民风和平，没人愿意铤而走险。

30年代，温州监狱曾经是全国模范监狱，抗战期间，日军以一个排的兵力占领温州而未遭抵抗，解放军进城也是未费一枪一弹。温州人得益这个和平心态，政治安定而没有兵灾战乱，混合经济使自然资源得以保护，历代下来，民间积累了无数的财富，一旦制度开放，私有财产犹如冰山一角冒出水面，一旦制度稳定，温州民间财富还要更浮出一层，使世人惊讶！

◇ 保皇派和造反派

温州文革运动走势大致如全国其他边远一样，先是本地籍在京读书的红卫兵回家乡点火，再是造反派抓斗当权派，成立各级革委会成为权力中心，当权派通过未能进入权力中心的另一派群众组织夺权，双方血战，最后背靠林彪江青的一派取胜，终于全国山河一片红。

一派温联总主要组成部分为温州市政府各直属单位的基层干部，中坚力量为温州港务局和温州化工厂工人。温联总总司令姚国麟退伍军人出身，深受分区和人武部信任，温联总外围群众基本是文革前制度的拥护或既得利益者，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定名为保皇派正是名副其实。

工总司方面则通过温州籍的北京红卫兵与中央文革直线联系，占据当时温州最高建筑电报大楼，中坚力量为温州冶金厂和温州造船工人，基本群众为文革前制度的反对或受害者，定性为造反派恰如其分。

◇ 强龙压住地头蛇

上述温州两派政治特征在当时全国各城市两派特征基本一样，但也有其特殊之处：温州地方各级政权49年以后为共产党接管，干部来自两个系统：许世友带来的山东籍部队军官和龙潜领导的浙南游击队干部。浙江共产党于1930年前后在浙南山区组织游击队，时强时弱，时隐时现。主要领导人物为项英和龙潜，项英于皖南事变被俘处死，龙潜坚持下来，文革时任浙江军区副司令。两派时称北佬派和

浙南派，一贯明争暗斗，每次较量总是强龙压住地头蛇。文革时期温州两派对立至于血战。除了全国性的老军头和政治暴发户之争外，还有强龙与地头蛇之争的因素在内：温联总背后有山东强龙，工总司背后有浙南地头蛇。

◇ 铁杆保皇派王福堂

温州武斗战事特别激烈是由于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温州属于对合作战的前沿，温州军分区当时是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军分区级单位，编制等于加强师。分区司令王福堂红四军出身，一直在许世友的部下作战，长征时期跟着许世友一起受张国焘误导，陷入西康沼泽地区，被马步芳骑兵围歼，他追随许世友得以突围，与其结下生死知交。许世友最为毛泽东爱将，当时以南京军区司令至尊统管华东军事，王福堂自以后台硬，不买造反派的账。对江青出言不逊。在他的授意下，温州军分区统管下的人武部发放民兵武器武装温联总。温州市委让出市委所在的市中战略要地，温联总在分区军事顾问的策划下，指定了一举歼灭工总司的作战计划。

工总司口号是誓死捍卫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受浙南干部派暗中支持，当地底层民众中有广泛同情者，加上北京有人，通天有线，所以政治上一直占上风。军事上却处于劣势，工总司领导层面基本由两类人组成：政治嗅觉灵敏的投机文人，痛恨官僚体制，向往四大自由的青年工人。他们均缺乏军事斗争经验，所以武斗之始就以守为攻，据点求援，占据电报大楼和温州酒家两座高层建筑物，拼命向中央文革求援。温联总很快扫清外围障碍，但是久攻不下两个制高点，1968年8月，终于，用火攻拿下了温州酒家，但最繁华的市中区却烧成一片废墟。温州历史名人谢灵运故居，如今只剩下墨池巷一个空名。至此，工总司孤守电报大楼，温联总全胜只日可待。

◇ 梅岙渡口阻击战

就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央文革终于跟林彪达成政治交易，林彪命令驻浙野战军20军火速赴温州武装支左。20军毕叔普团为先头部队，从金华下火车，征用了当地几十辆汽车，浩浩荡荡通过丽水直扑温州。

温联总闻讯一面猛攻电报大楼，一面在温州军分区军事顾问帮助下组织阻击，企图延缓20军的到来，战场选在离温州15公里的温金公路的梅岙渡口，温州军分区基层军官着便衣直接投入梅岙阻击战，毕叔普团根本没有料到会遭到如此猛烈的阻击，一时被挡在瓯江北面过不来。毕叔普发起野性，组织重武器强攻渡江，惨重伤亡之后得逞，一路浴血杀向温州。1968年8月的梅岙阻击战是温州武斗最激烈的一场战斗，也是温州有史以来最激烈的战事。梅岙阻击战实际上是南京军区的地方部队和林彪的野战军对阵。三十年过去了，参加这场战斗官兵是否还记得那激烈的战斗场面和在这场战斗中失去生命的兄弟？温州梅岙渡口阻击战应写入解放军战史，它和六·四一样永远是解放军的耻辱的一章。

◇ 追捕匪首姚国麟

毕叔普团终于打进温州，在最后一刻解工总司之围。温州立刻实行军管，温联总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参加过武斗的被定性为土匪。温州军分区被彻底解散，王福堂被残酷批斗，批斗者将王福堂架起飞机，手指强箝他的两个鼻孔向后拉，老脸几乎被撕裂，场面惨不忍睹。

毕叔普接管温州军分区和主掌温州军管会，全力组织索剿温联总残余力量。温州所属七个县，各县军分区人武部都有温联总的同情势力。毕叔普的清缴土匪工作非常艰难。匪首姚国麟几次眼皮底下脱身，其惊险离奇可著书拍电影。当时温州主

要街头设有剿匪快讯专栏，每天报道追捕姚国麟进展。姚国麟曾经北蹕逃进文成的北雁荡山，南下逃往洞头岛，当时如有台湾接应，他可能会逃出大陆，该犯最后在温州北部藤桥山区被围数日，亲信打散，孤身持双枪拒捕，终于被轰毙。姚国麟尸照，成了毕叔普向九大献礼的材料。

姚国麟事迹具有传奇色彩，此处不是重点不予赘述，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他能活到四人帮倒台，政治前景看好。王福堂遭难时曾对造反派明言：文革后骑马的还是骑马，抬轿的还得抬轿。果然，邓小平时代，王福堂以老病之身升任浙江军区第一付司令，对曾经死保过他的人当会重报。

◇ 祝福温州

三十年前我亲历了这段难忘的历史。在温州市中区大火燃起之日，我们全家逃往瓯江对岸避难，暮色已浓，小船在江心摇荡，目睹市区烟火冲天，恐怖深深打入我的童年的记忆之中。今天梅岙渡口早已不见了，但每次车驶过梅岙大桥都使我激动。我祝愿温州和平富饶！温州人民幸福安宁！

□ 寄自 songhong1@yahoo.com

~~~~~

【五洲震荡】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一个外国汉学家回顾文革

• 林培瑞 •

◇ 瞎子摸象

今年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中国人作回顾的同时，像我这样的外国汉学家，也不妨作一点回顾吧。

一九六六年我刚大学毕业，学了点中文，中国的媒体发出来的理想主义口号对我很有吸引力。当时我常看《中国建设》，学习怎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甚至偶尔还戴上毛像章。很想到中国去，但中美两个政府都不允许。

一九七二年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到美国来，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第一次公开的来往。我很荣幸的被选为美方翻译之一；后来，因为我和其他五位美国翻译的这项服务的关系，中美两国的政府似乎都改变了初衷，批准我们去了一趟中国。

我们一九七三年五月动身，兴奋不已，喜出望外。四个星期里头跑了七个城市——广州、上海、苏州、西安、延安、北京和唐山。费用少得不可思议：吃、住、玩和一切交通费用加起来不过五百六十块美元。

当时到中国去的白人真是很少，我们到哪里都享受非常特殊的待遇。每次上公共汽车，卖票的大声喊，“外宾！外宾！让位！”然后我们上了几个人，马上就空几个位子。我们自然感到难为情，怎么会愿意坐呢？有一次，一位中年工人让给我的时候，我注意到一副很疲倦的脸，知道他并不是很情愿站起来的。因此我也拒绝坐，恳请他再坐下。但上面吩咐，他不可能再坐。车上虽然挤得不堪，那个位子却一路上都是空着的；真是滑稽现象。

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小孩成群地跟着我们。走了二十分钟后就会有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小朋友，像彗星的长尾巴一样，默默地跟着，不走太近，不太说话，但



不管多么远也不散。有一次我们穿过动物园门口，已经买了票的小朋友就跟上了我们；显然，我们比斑马、长颈鹿还新鲜。

我偶尔喜欢停下来和小朋友们谈话。有一次我问了他们将来想作甚么。

“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为人民服务！”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用响亮的声音回答我。

“像甚么地方呢？”我问了他。

“像……”他想了一会儿：“像新疆啊！”

“你呢？”我问了另外一个小朋友。

“我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人民服务！”跟刚才的回答一模一样。

问了十几个小孩，都照样重复了那句话。除了那句话，几乎甚么也不愿意说了。

我们作为外国客人，连比较艰苦的地方都不容易看到，更不必说“最艰苦的地方”了。只有到唐山的时候，访问了有名的煤矿，坐电梯下到了矿底的隧道网，那里坐上了小轨车，大概走了四十分钟。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矿外头，不管到哪里，都看的见毛语录，红红金金的都是很漂亮的牌子。但是矿底下，虽然有灯和许多工作有关的牌子，但是毛语录都没有。

出来以后我问了我们的官方导游为甚么矿里没有毛语录。他想了一会儿回答：“唔……太脏了吧？对毛主席的语录不够尊重，工人自己不愿意。”

我当时基本上还是很羡慕毛时代的理想主义。只有听到这些反面的线索以后才开始发生怀疑。为什么十几个小孩里头没有任何不同的想法？为什么所谓“太脏的地方”对于几万个活着的工人不算什么，但对毛泽东的话反而就“不够干净”呢？

一九七九年我到中国去住了一年，那时是伤痕文学的高潮，我六年以前发现的小线索现在已经变成大河流了。我一层一层地更深入的理解了毛时代的真实情况，一方面感受到了毛的骗，一方面怪自己本来太天真。

承认自己受了骗，自己太天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而且，受骗的时间越长，放弃幻想就越难。很多美国自由派，亲左的所谓“liberal”都有这个问题。我自己父亲可以作个例子。他老人家一九零七年出生，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恐慌的时候受过苦，开始向往左派思想，羡慕过苏联，几次带了旅游团访问苏联，越访问越相信共产主义。六十年代毛泽东批评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爸爸觉得毛对。我小时候一直跟着爸爸信社会主义。后来到中国去，发现爸爸的理想和中国的日常生活根本不是一回事，大失所望。但是我告诉爸爸真实情况却一点不起作用。他不太相信，反而觉得儿子受了资本主义的影响。

为此，我颇有几分有苦说不出的感觉，但后来想了个法子。父母退休了，表示愿意到中国去教英文，我介绍他们一九八三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住了半年。我以为，让他们去住一段时间，就是不懂中文，一定也可以感觉出来毛的宣传和中国的日常生活之间是有距离的。但是我估计错了。爸爸回来说中国很好，正在“清除精神污染”。毛还是对的。江青四人帮也不像政府说的那么坏。

我那时候才深深地体会到，并不一定客观事实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信仰，尤其是一辈子根深蒂固的信仰。积累久了的情感和理想比事实更有力量。我爸爸这种好心的美国左倾知识份子，对于中国文革抱的希望尤其没法子改变。在他们看来，中国似乎不是实际的中国，而是一个奇妙的镜子。美国社会有什么问题，遥远的中国能够反应出一个理想的解决法。美国贫富悬殊太大，中国是平等主义；美国犯罪率太高，中国路不拾遗；美国人自私，社会主义新人都大公无私。有这种理想的美国人之所以没法子放弃对中国的幻想，是因为放弃了它等于放弃了改变美国的希望。

韩丁（William Hinton）先生出了一本新书。韩丁本来是美国人，在毛时代的中国住在中国农村，写了一本叫做《翻身》的长篇著作，盛赞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邓时代的改革一来，韩先生大不以为然，他这本新书叫做《从九天之上到九地之下》是歌颂大寨的主角和文革时期的政治局委员陈永贵，说陈在毛时代的大寨过的是天堂般的精神生活，后来在北京公寓里头过的却是一种地狱生活。我爸爸今年八十八，肯定会喜欢韩先生的书。

#### ◇ 极权和反作用

一九六六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这个美国人对这个运动的初步印象是很好的。那年我刚进中国历史研究所，最羡慕的是文革目标的彻底性。不但是要改造社会，而且要改造人的自私心理，要“斗私”，要“一切为人民”，要“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觉得多好啊，多大胆！

后来发现我同辈的很多年轻中国人本来有过同样的感觉。他们决定以身作则，抱着很崇高的理想和献身精神到中国农村去参加劳动，“提高自己的革命觉悟”，等等。没想到的是到了人民公社以后，发现农民的生活和本来所抱的社会主义理想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回事。农村的普遍贫困是主要问题，但是很多别的社会情况也远不如理想。当地的干部骄傲不讲理，甚至剥削、虐待、强奸，和雷锋模型相比的话，是一个大讽刺。“为人民服务”和其它漂亮口号都显得空洞和虚伪。

有一位加拿大华裔学者，名字叫梁丽芳，前年出了一本书，里头搜集了二十六篇访问录，受访者都是中国中年作家，包括莫言，王安忆，张承志，郑义，等等。这些作家几乎都是六十年代热情献身于文革，后来大失所望的人。但梁教授发现这一代到了七十年代末，并没有因为理想落空而放弃了理想。放弃的只是盲从权威的习惯，本来的理想主义却还依然活着。文革的经验给这一代人带来的最后效应不是“朵朵葵花向太阳”，而是一种反抗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八十年代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文化热”和“八九民运”都跟这一代人在文革期间产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有关。九十年代初，刘宾雁说了一句“没有文革今日中国可能跟今日的北朝鲜一样。”这句话很值得深思。

但是文革的效果，果真是如此的话，那就等于文革的极权主义起了很大的反作用。种下的种子是反对极权主义的。梁教授的书名叫做“早晨的太阳”就包涵着这么一种微妙的涵义。她借用了毛泽东一九五七年的名言，“你们青年人…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可是那一代青年走的路子不是毛先生所希望的。也可能不是他能够想像得到的。

九十年代，文革的另一方面的很有意思的反作用出现了。在毛时代的中国，一切“资产阶级”行为都是避讳的。地主、资本家和一切“剥削者”的形像都是反面教材，而且描绘得很清楚、很新鲜生动的：住大楼，开快车，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八十年代邓小平说“发财是光荣的”，到了九十年代有一部份人在中国的商业化社会里头发大了或大或小的财，他们的行为模式是什么呢？似乎没有别的，只好参考毛所骂的那种反面形像，只是现在由反面教材成了正面教材、好行为了。毛时代的

极端禁欲主义，物质需求积累久了，造成物极必反，现在晃到另一个极端，成了一种放肆主义。

可惜的是，毛所描绘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过于简单的卡通漫画。实际上的西洋资本主义多多少少受民主法制的制约。法律制约诚然不是最完善的，时时刻刻需要公民投票者的监督；但现代的西洋资本家，哪怕是野心最大的、最不择手段的人，也很难像毛所骂的那样轻易剥削，放肆欺骗，无恶不作。要是一部分中国人，从毛那里得到的印像是这种行为应该是发了财的人的自然行为，那恐怕也得算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相当大的反作用。

反作用的产生不限于文革。大跃进也是一个例子。中国自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追求国家富强，大跃进的目标也是“超英赶美”，但在经济上的实际效果却是相反的，不是大跃进而是大跃退。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实际上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饥荒。与大跃进同时，也就是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同样是为了中国更富强的目标，鼓励中国人口尽快增长，把提倡计划生育的马寅初教授骂为“资产阶级思想家马尔萨斯的信徒”。后来，到了八十年代，仍旧是为了中国更为富强的目标，政府宣称“独生子女”的政策，这个政策也应该视为毛的五十年代末政策的反作用结果。

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里起反作用并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而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德国、日本、苏联、罗马尼亚、伊朗、伊拉克、乌干达和其它国家的现代历史上都可以找到的极权主义导致反作用的例子。闯祸的方式有时候是打侵略战争，有时候是国内搞斗人运动，但所有的例子都有两个共同之处：(1)指挥的人都是自称最正确的极权主义者。(2)遭殃的人都是服从，甚至“全心全意服务”的老百姓。正相反呢，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历史上，很难发现在国内搞过斗人运动的例子。侵略战争和庞大社会运动的出发点都是极权主义者自己的蓝图。他们很相信他们的蓝图，以为别人不相信是因为别人的水平不够。他们势力那么大，有时候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殊不知社会生活是复杂多端的，并不是一部汽车，你想把它开到那里就可以开到那里。

民主政治不是没有毛病的，但它的基本性质是承认社会的多元性。民主政府的领袖知道为所欲为是做不到的，颁布自己的伟大蓝图是没有用的。伟大蓝图因为用不上，所以也自然起不了一贯的反作用。

□ 原载《北京之春》第38期

~~~~~

【历史文献】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 毛泽东 •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这场黑人的斗争风暴发生在美国国内，是美帝国主义当前整个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它给陷于内外交困的美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

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它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取得彻底解放。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白人中的广大劳动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斗争目标。因此，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国白色人种中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必将同美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最终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罪恶统治。

我在一九六三年《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说过：“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我现在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当前，世界革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美国黑人争取解放的斗争，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份，是当代世界革命的一个组成部份。我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一切愿意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人们，行动起来，给予美国黑人的斗争以强大的声援！全世界人民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向着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们发动持久的猛烈的进攻！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

【读者来信】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编辑：

增刊156期（zk9809a）《第一次联动大会目击记》中所提到周春英是原总后勤部副部长周玉成中将之女。

一读者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           |           |                                                            |
|-----------|-----------|------------------------------------------------------------|
| 本期责任编辑：   | 华新民（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本期 校对：    | 钟 超（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读者技术咨询：   | 徐名扬（澳大利亚） | <a href="mailto:cn-d-help@cn-d.org">cn-d-help@cn-d.org</a> |
| 网络技术维护：   | 张雨田（美国）   | <a href="mailto:cn-d-info@cn-d.org">cn-d-info@cn-d.org</a> |
| 《华夏文摘》主编： | 李彤彬（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CND》总编：  | 熊 波（美国）   |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mailto: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mailto: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或 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 T P）：ftp.cnd.org[207.151.78.100]: pub/hxwz  
或 canada.cnd.org[142.132.12.100]: pub/cnd/

hxwz

万维网服务站（W W W）：http: //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HTML version rendered by WL, XT and GC